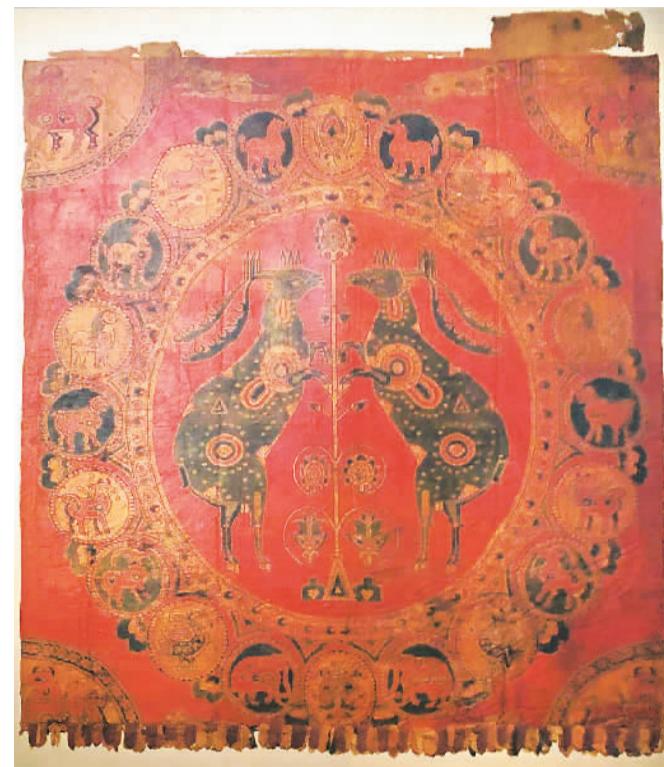


全球首个吐蕃文物大展亮相敦煌 再现千年前丝路文化交流盛景

□ 本报记者 邹雅婷 文/图



由敦煌研究院与美国普利兹克艺术合作基金会主办的“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吐蕃时期艺术珍品展”，汇聚海内外近30家文博机构的珍贵文物，立体呈现了吐蕃时期的文化艺术及其与丝绸之路沿线文明的交流



团窠对鹿纹挂锦，中亚，瑞士阿贝格基金会纺织品保护研究中心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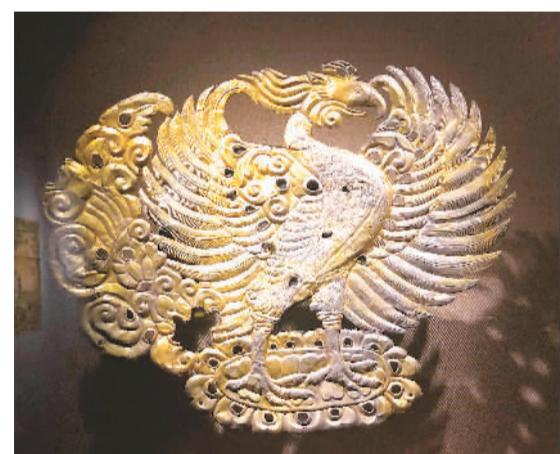
神鸟神兽纹嵌绿松石金胡瓶，中亚西部或吐蕃早期，美国普利兹克收藏

提起丝绸之路，你想到的可能是四方辐辏的长安城、穿行大漠的驼队或是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的游记，很少有人会联想起吐蕃。事实上，在公元7世纪至9世纪，青藏高原上崛起的吐蕃王朝，与中原唐王朝乃至相邻的南亚、中亚各国开展了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形成了交错纵横的“高原丝绸之路”。

近日，“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吐蕃时期艺术珍品展”在甘肃敦煌莫高窟开幕。这是全球首个以吐蕃为主题的文物大展，通过120余件套海内外珍贵文物，立体呈现了吐蕃时期的文化艺术及其与丝绸之路沿线文明的交流互动。

众多珍品首次来华

走进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映入眼帘的是绚丽多彩的丝织品、精美夺目的金银器、雍容优雅的佛像，给人带来极大的视觉震撼。本次展览由敦煌研究院与美国普利兹克艺术合作基金会主办、海内外近30家文博机构协办，汇聚了许多难得一见的文物。除了美国普利兹克收藏的精品外，还有来自瑞士阿贝格基金会纺织品保护研究中心、日本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俄罗斯圣彼得堡艾米



凤鸟纹鎏金银饰片，吐蕃时期，美国普利兹克收藏

塔什博物馆、芝加哥艺术博物馆、阿勒萨尼基金会等海外机构和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等22家国内机构的珍贵文物，其中大部分海外展品均是首次来华展出，而瑞士阿贝格基金会的藏品更是首次向公众展示。

展览分为7个单元，分别是“史前的青藏高原”“吐蕃登上历史舞台”“贵族盛装和礼器”“贵族营地——丝绸和金器装饰”“贵族飨宴”“贵族狩猎”和“佛教在吐蕃的发展”，从吐蕃文化的渊源、发展背景说起，通过吐蕃贵族生活的各个方面，讲述了吐蕃文化与丝绸之路沿线文化的交融。

在“贵族营地”单元，展示了2幅世所罕见的中亚团窠对鹿纹挂锦，它们分别由美国普利兹克和瑞士阿贝格基金会收藏，代表了7世纪中期至8世纪丝绸之路沿线织造工艺的最高水平。这两幅挂锦高2米左右，宽分别为1.6米和1.7米，中心图案均为两只鹿立于生命树旁，但鹿和生命树的造型各不相同，主体图案边廓均饰有一圈动物纹样，四角亦有纹饰，色彩艳丽，栩栩如生。如此宏大复杂的图案，需要横跨织机才能织成，充分体现了当时织造技艺之精湛。

普利兹克艺术合作基金会联合创始人兼首席策展人大卫·普利兹克介绍，这种大幅挂锦主要用于装饰游牧民族首领的营帐。不论是吐蕃赞普还是阿拉伯哈里发，均有在毡帐里举行集会的传统。这种毡帐十分庞大，可以容纳100多人，并用奢华的金银器和丝织品装饰，因此也被称为“金帐”。“金帐”是王权的象征，蒙古人也有类似的习俗，成吉思汗后代建立的钦察汗国被称为“金帐汗国”。

创造性吸取各族文化

作为此次展览的策展人，大卫·普利兹克在挑选展品时，尤为注意体现多种文化的交融。通过丰富多样的展品和精心设置的展线，生动讲述了吐蕃如何创造性地吸取周边文化的精华，并逐渐活跃于历史舞台的历程。

“吐蕃金银器当中，最为精美的当数各类容器。其中的持壶，是典型的来源于西方的器型。唐代的文献记载中，也将这种持壶称为‘胡瓶’。”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霍巍教授介绍，胡瓶不仅是当

时生活中的实用器物，也是社会交际往来的一种礼品。据史书记载，胡瓶曾是唐朝与吐蕃王朝之间友好往来的重器。

展览中有件美国普利兹克收藏的金胡瓶，是同类器具中最大的一种，高近50厘米。胡瓶上饰有凤鸟纹、鸳鸯纹、狮纹、羊纹和有翼独角兽纹等，并嵌有绿松石，外形华丽精美，制作工艺精湛绝伦。大卫介绍，制作这件胡瓶的粟特工匠别具匠心地融合了萨珊、中亚和唐朝的样式，以迎合吐蕃贵族的审美趣味。

“吐蕃贵族盛装”单元展示的一件幼儿锦袍，是迄今存世极少的吐蕃时代成衣。这是一件上衣下裙式样的对襟短袖衫，采用质地较厚重的织物制成，上衣部分有鲜艳的联珠团窠对鸭纹饰，下裙为藏青色。与之相配的一双幼儿靴子，由绛红色丝织品制成，表面饰有联珠团窠花纹、缠枝花鸟纹及人物纹等暗花纹样。霍巍指出，这套衣物的式样深受唐代中原服饰文化影响，而上面的纹饰又是当时丝绸之路沿线流行的联珠团窠对鸟纹之类的西方图案，由此可见吐蕃对唐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的吸收、融合。

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

此次展览是普利兹克艺术合作基金会首次举办的国际大展。在筹备过程中，国内外近30家机构和私人收藏家通力合作，共同奉上这场文化盛宴。

敦煌是古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历史上多种文化、多种宗教荟萃于此，历经千年营建的敦煌莫高窟，正是丝路文明的结晶。8世纪后期至9世纪前半叶，敦煌一带为吐蕃所管辖，这期间敦煌莫高窟新建洞窟56个，续建前代洞窟20多个，藏经洞保存的文书中也发现了这一时期的大量经卷文书。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说，此次展览落地敦煌，仿佛再现了1000多年前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盛况。

“丝绸之路将我们的世界连在一起，它不仅是贸易，而且是文化、宗教等多方面的连通。”普利兹克艺术合作基金会创始人兼主席汤姆·普利兹克说，此次展览由中国国家文物局促成，得到了多方支持与帮助，是中美间文化交流的重要活动。

据悉，展览将持续至10月22日，展期内还将在敦煌举办相关学术研讨会。

◎家风家训

《袁氏世范》不失为“《颜氏家训》之亚”

□ 谷 敏

在中国古代家训史上，有一本十分重要的家训书籍，那就是北宋袁采所撰的《袁氏世范》。清代四库馆臣给予它极高评价，认为它“不失为《颜氏家训》之亚”。该书不仅为教诲袁氏子孙所写，也写给“田夫野老、幽闺妇女”，说理深入浅出，别具一格，海内外不少学者均对此书有研究。

袁采，字君载，生卒年不详，浙江衢州人，南宋隆兴元年（1163年）进士，其为人才德并佳，时人称赞他“德足而行成，学博而文富”。袁采编写的《袁氏世范》，主要分为“睦亲”“处己”“治家”三个部分，分别从与亲人相处、自我提升、治理家庭三方面谈立身处世、待人治家之道。无论是哪一部分，袁采都力图从实践出发，从自己对生活的观察出发，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家风家教提出最诚恳的看法。

“睦亲”部分，袁采谈到如何对子女一视同仁。他写到，为什么有些子女对父母不那么孝顺，尤其是一些长子长女对父母多有抱怨？那是因为长子长女觉得父母在面对诸多孩子时，不能平等对待自己。幼子幼女刚出生时，又萌又乖，“虽他人犹爱

之”，何况自己的父母呢？但此时，也往往正是家中长子长女“损动器用，冒犯危险”、个性勃发之时。此时父母很容易“移其爱长者之心而更爱幼者”，导致对长子长女较为苛刻，对幼子幼女则溺爱有加。袁采提醒为父母者，既然选择养育多个孩子，就应该了解子女在不同成长阶段的状态，冷静理智地对待，“不可任意而行，使长者怀怨，而幼者纵欲，以致破家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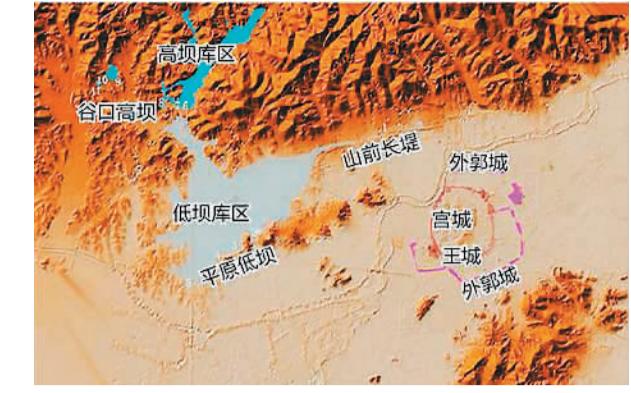
“处己”部分，袁采谈到人到中年的自律。他写到，一些白手起家的人行至中年，事业上已有所收获，“见所作事无不如意”，变得懈怠贪婪起来，而还以为已经拥有的一切“独能久远，不可破坏”。他们不知道，破坏自己美梦的人就出生在家中，“曰子曰孙……恨其父祖目不及见耳”。子孙没有机会感受父祖在年轻时的励精图治，耳濡目染的却是长辈们“志气洋洋，贪多图得”的状态，他们又怎么可能守住家业，甚至超越长辈呢？为进一步说明人到中年更需严格要求自己与子女的道理，袁采还讲述了一个小故事。他说，我认识的一位长者，辛苦一生，建了一所大宅院供家人居住。竣工后，他请建

房子的工匠们在新屋的东厢房吃饭，并对客人们介绍说，这是为我造宅第的人；又将族中子弟安排在西厢房吃饭，对客人们半开玩笑地说，这是将来卖我房子的人。很不幸，最后被他说中了。

“治家”部分内容也非常丰富。他谈到“远亲不如近邻”的问题，“睦邻里以防不虞”，融洽的邻里关系对于家庭建设十分重要。他举了一个反面案例来说明自己的观点：从前有一位土大夫，平时仗着自己位高权重，看不起周边的邻居，甚至“残虐邻里”。有一天，仇人来烧他的屋子，杀他的家人，邻居们居然互相告诫说：千万不要去救火，如果去了，火熄之后，不仅没有功劳，这家人还要因为我们接近了他的家的宅第来与我们打官司，怀疑我们盗取他家财物，“若不救火，不过杖一百而已”。按照宋代法律，如果邻家失火，周边的住户若不出手相救，都需要受到杖刑。这位土大夫平日不注重与邻居维持和睦的关系，导致遇到灾祸时邻居们宁肯受罚也不愿帮忙，“此其平时暴虐之效也”。

《袁氏世范》通篇闪耀着理性与温情之光，虽距今已近千年，仍值得借鉴与参考。

◎文明密码



良渚古城及外围水利系统结构图

良渚遗址与用水的智慧

□ 闻 白

良渚古城遗址毫无悬念地申遗成功，成为中国第37处世界文化遗产。作为5000年前中国长江下游一个早期国家的中心所在，良渚以其规模宏大的古城、功能复杂的水利系统、等级分明的墓地（含祭坛）等一系列遗址以及具有信仰与制度象征的玉器，实证了5000年前中国长江流域稻作农业文明发展的高度成就，更成为探讨整个东亚地区早期国家复杂化程度的样本。

80多年持续不断的考古工作，从各个环节支撑并完善了良渚遗址的文化价值。关于良渚水利系统的最新考古发现也包含在申遗文本中。从2009年考古人员发现彭公岭水坝起，古城外围治水系统的调查与发现就不断刷新我们的认知。目前的证据显示，良渚先民在古城建设之初，就有极其智慧的通盘考虑，在这一流域的上游、中游、下游兴建了不同类型的水利设施，组成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水利体系，具有防洪、农田灌溉和运输等综合功能。先民们大约治理了50多平方公里的流域，使王城外围100多平方公里的区域受益。良渚水利系统显示了当时国家在动员社会力量建设大规模公共事业时的超强组织能力。得益于这项宏伟的水利系统，周边的土地成为稻作良田，从而使良渚文明繁盛千年，在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良渚先民与水打交道的智慧在这一水利工程中随处可见。比如建造古城所需的石材、木材、竹材都来自与上游堤坝相连的深山。他们通过不同层级的水坝把水位抬高，然后把石材、木材、竹材等放到水里，通过翻坝的形式运下山来，再通过附近的河网运输到古城周边，供筑城使用。在部分坝体的关键位置，良渚先民采用“草裹泥包”的方式堆垒加固，这种工艺类似现代人抗洪时用草包或编织袋装土筑坝，不仅增加了坝体抗拉强度，让水坝不易崩塌，而且加快了堆筑速度。

自古以来，人类的生存发展离不开水，气候变化、人口迁徙、宗教信仰、科技革新都会体现在水的利用与管理中，当然也在各类文化遗产中有所呈现。中外的水利工程以其独特的文化价值，屡次受到世界遗产委员会青睐。在中国的世界遗产项目中，都江堰、大运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等包含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人们治水的经验。比如云南红河哈尼梯田，与梯田相关的灌溉体系遍布整个山区。红河流域属于低纬度亚热带高高原湿润季风气候区，雨季较长，降水量大，并不存在缺水的问题，其灌溉系统主要侧重于解决水量的分配。数量庞大的小型沟渠将水流从山顶的森林引入下方的村寨和梯田，形成一套遍布山区和梯田的灵活水网。

干旱的沙漠环境要求开发地下水并减少水在运输过程中的蒸发；季风气候要求某些岛屿有良好的蓄水设施来平衡不同季节和地区的水量差异；高山则需要发展出渡槽、隧洞等渠道技术来拟合地势高差，保证水资源长距离调配……总之，独特的地形和气候要求人们选择与环境相适应的水利模式。代表欧洲灌溉技术的案例在世界遗产名录中数量较多，近年来中东和东南亚地区的案例数量也在增加。

以中东为例，近些年有两项水利系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一项是阿夫拉贾灌溉体系。它是在中东地区极端干旱环境下产生的，整个灌溉体系的原理看起来并不复杂，先采取堤坝截流、山泉引水、打井等不同方式来获取水资源，再通过较长距离的主干渠引水到村镇，然后进行进一步的分配，用于生活或农业灌溉。还有一项是坎儿井，主要用于沙漠地区地下水的收集和输送，在中亚分布广泛，在新疆境内也很常见。坎儿井的重要渠道设施基本于地下开凿而成，利用水源地到用水地的自然高差，挖出不同梯度的隧道来分层送水。

荷兰的世界文化遗产也有多项与水有关，不过他们需要和谐相处的是海水——既有填海造田的斯霍克兰农业景观，也有井然有序的阿姆斯特丹运河带，还有为防止海水倒灌而使用蒸汽作为水利管理动力的最早泵站和为减少海风侵蚀而建造的堤防风车群……

“自然资源的利用”属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年鼓励申报的主题，记录不同时期“科技发展”的遗产还有许多空白需要填补，水利系统可以说同时符合这两种需求。至少从良渚文明起，中国人就在广袤大地上开始了各种水利实践，春秋战国时的灵渠、郑国渠等水利工程已经显示出高超的技术水平，而像宁夏引黄古灌区、湖南新化紫鹊界梯田等灌溉遗产的重要性也正逐渐被认识。它们都是古老东方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在今后的申遗中给予更多的关注。



良渚古城水利系统堤坝关键部位以“草裹泥”工艺
堆垒加固 新华社记者 王定昶 摄